

中式博物 世界楷模

——生物多样性的博物学视野

彭兆荣^{1,2}

(1.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, 重庆 401331;

2.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要]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,生物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的今天,全世界都在行动。从学科角度上看,博物学在这一重大挑战面前,无疑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;尤其是中式的博物学,集中式智慧、中式道理、中式方法于一体,特别是“天地人和”“社稷农耕”文明所表现出许多方面的“可持续性”,堪为世界楷模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,应珍惜这一文化遗产并致力传承好。

[关键词]博物学;天地人和;食物链;中医药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1.09.011

一、引言

2020年9月30日,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“坚持生态文明,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力。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,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”。同时向世界承诺:“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,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。加快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步伐,划定生态保护红线,建立国家公园体系,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,提高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”,并承诺“中国将于2021年在昆明举办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,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”。^[1]

当今世界,由于生态危机,自然界保持生物

多样性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。因此,维护生态安全,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“世界共识”。如何从科学—学科的角度配合这一重大议题,是摆在整个学术界面前的重大任务。无论是研究生态抑或生物多样性问题,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,即特别强调整体性和总体性,而在当今相关的学科分类中,博物学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,原因有二:首先,其以整体、整合的研究见长;其次,这一学科直接以“生态—生物”为研究对象。当今的世界问题与学科问题是一致的:一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专业、细微;另一方面,越来越需要从总体格局上进行思考、把握和治理。对于“生态—生物—生命”的相关命题,博物学不可或缺。然而,在我国的教育与科研体系中却没有博物

作者简介:彭兆荣,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,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(一级岗)、博士生导师。

学,这种缺失需尽快补上。

值得特别强调的是,中国传统的博物学、博物志,还有笔者称之为的“博物体”,^[2]由于贯彻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“致中和”原则,视万物为一个相关的生命共同体,与西方的博物学中“二元对峙”原则相比,更接近于整体维度。其实,像“天时地利人和”这样的表述时常被人挂在嘴边,宛若箴言,皆知其为道理、哲理。然将其视为博物智慧的却不多,原因是与我国传统的“博物”定义不吻合。窃以为,在今天的语境中,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式的博物学思想,特别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与生活保持密切的协同,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相结合,表现在二十四节气、月令体系、物候形制等,成就了特殊的中式博物思想中可持续性发展的因子,这些在今天面对生态危机、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世界议题中,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示范作用。

二、中式博物的生命观

博物学在学科研究方面除了“全观性”外,还具有生命的“照应性”,即在整個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种类互相照应;尤其是以自然界为背景,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类之间的协作与共生。而我国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思想就是这一原则的生动写照,——除了“天—地—人”的协作,还有“时—利—和”的农耕文明的博物学思想。众所周知,“天时”最重要的表现形态为“农时”机理。具体而言,农业生产遵循农时而进行,以保证人们的生计,形成了“五生”的关系链:生态、生命、生计、生产与生业,——因为自然生态而有生命,维持生命需要生计,满足生计需要进行生产,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业(行业)。^[3]换言之,此说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民亲近自然,以天地为认知背景,创立了“天时”与“物候”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认知性生态协同体系。^[4]

在中式传统的博物学思想中,自然界的规律与人的生命律动表现为同一频道的演出。以“日(太阳)”为例,“日行”原本只是日月星辰的自然

运动,但依照中国传统的博物思想,这一自然现象不仅构成了宇宙观的重要范式,——中国的时间制度来自于对“日行”的观测和计量(日晷)。“时”为“日族”,构成了我国传统的时间制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时间体系皆从“日”。而且,传统的农事、农耕、农作皆以“天时”为据,配合土地上的“农时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:“时,四时也。从日寺声。”而天的时间形制“天时”与地的时间形制“地辰”相互配合、相辅相成。《说文解字》释:“辰者,农之时也。故房星为辰,田候也。”辰如龙象。^[5]这样,天地人便成贯通性文化态势:天文—地文—人文。

我国的博物学思想是以天、地、人“三才(材)”相互协作的“生命共生”为依据的。具体而言,天地(自然)规律由人执行,特别是体现在农作之中,比如我们迄今仍然说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说的正是根据“天时”进行生产和生活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,人作为一种“能动”的生物,从来就包含着主导性,但这种主导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、服从、贯彻和实践的基础上。传统的“月令”即为典范,《礼记·月令》即是一篇讲究时令的篇章,大量记载与农时有关的事务: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,每季具体分为孟、仲、季三月,依阴阳五行,阐述人们按时节、时辰活动的情形。故《礼记·礼运》如是说:“播五行于四时,和而后月生也。”^[6]

在传统的中华文明中,生命以“气”为表征,亦为“自然人化”之表述。当我们说一个人生命力旺盛的时候,常以“生气勃勃”加以形容,表述人死了的时候,则以“气绝身亡”来表述。即使是日常生活中,“生气”既可表述正面情绪(指有活力),又可表达负面情绪(指不高兴)。而“气”的本义却是自然现象,特别表现为“天时”的生命体现。“气”在文字学上属于“天部”,甲骨文“𠄎”是特殊指事字,字形在表示天地的“二”的两横之间加一横指事符号“一”,代表天地之间的气流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气,云气也。象形。凡气之属皆从气。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“天气”。

“气”其实是以“天”契合“人”之命理,“气(氣)”中有“米”,说明生命靠养育。日本学者白川静释:“氣形示云流”,即云气,为生命之源,万物之根本。古人相信,“米”(谷物)有滋养“气”之功,于是加“米”构成了“氣”。^[7]这也是农耕文明的形象表述。

我国的天时与节气的关系不独为世界农耕文明的表率,也是博物学的经典表述与实践。二十四节气为典型的体系,农历二十四节气因此获得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二十四节气指农历中表示季节变迁的24个特定节令。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,计十二个节和十二个气。即一个月之内有一节一气,每两节气相距平均约三十天又十分之四,而阴历每月之日数则为二十九天半,故约每三十四个月,必遇有两月仅有节而无气,及有气而无节者。有节无气之月,即农历之闰月,有气无节之月不为闰月。其中核心概念之一,正是“气”。古人认为,一岁之间,“本一气之周流耳”。一年的节气变化就是“一气”的循环。二十四节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“节”,“节”就是为周流天地之间的“一气”画出刻度。^[8]

“气”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现象,在中式博物原理中常为“天时”的表象。具体的表现为“天时”与“气动”,——“时”为“气”的运行呈现,并成“节律”。后来,按气候变化的时序制定的历法节气也被称为“时”。陈旉在《农书》中说:“万物因时受气、因气发生,时至气至、生理因之。”后来的历法中规定的四时八节二十节气等即由此出。^[9]有意思的是,当“时—气”相协以表示生命动态变化的表征时,人的生命便与之对应,《黄帝内经》故有:“五脏应四时,各有收应,心者,生之本,为阳中之太阳,通于夏气;肺者,气之本,为阳中之太阴,通于秋气;肾者,为阴中之少阴,通于冬气;肝者,罢极之本,为阳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。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五脏各有其对应的季节,肝对应春天,心对应夏天,肺对应秋天,肾对应冬天。一句话概括:“养生依天时”。

农业生产其实就是根据节气进行有规律的

生产作业,即所谓的“趋时营农”,——根据四季的节律而劳动,最典型的说法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。春天萌生,夏天滋长,秋天收获,冬天储藏,既可指农业生产的一般过程,亦比喻事物的发生、发展过程。此说出典于《鬼谷子·持枢·全篇》:“持枢,谓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天之正也,不可干而逆之。逆之者,虽成必败。故人君亦有天枢,生养成藏,亦复不可干而逆之,逆之虽盛必衰。此天道、人君之大纲也。”所谓“持枢”,就是掌握行动的关键,把握事物的规律。在笔者看来,这正是中式博物学的核心价值,即根据自然的运行规律,配合以人的生命、生计和生产活动。

概而言之,中国的博物思想的圭臬是天地人的全观性配合,即根据自然,特别是四季、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业生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式的农耕文明正是博物学精华的体现,并将这一自然道理契合于万物的生命(包括养生)之中。而今的生态危机,很大程度上正是“人与自然”相互胁迫的后果与恶果。

三、中式博物中的“禾”与“和”

如上所述,“天时—地辰”应合“农时”,农耕文明在中式博物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,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嵌入在“禾—和”中:“禾”是粮食的泛称,而耕作粮食造化出了“和”(和谐、和平、和睦等社会伦理秩序)。农业生产最讲究农时,“年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农人依据天象时运的律动而劳作,“年”成为一个四季周期完整的时间概括。汉字“年”就是天时与地利的协作的产物,故从“禾”。甲骨文“年”属“禾族”,甲骨文𠂔即𠂔(禾,借代谷物)加𠂔(人,农人),表示农民载谷而归。造字本义是将收成的谷物搬运回家。“年”古时亦写作“秊”,《说文解字》:“秊,谷孰也。从禾,千声。”《春秋传》曰:“大有秊。”意思是说,“年”是禾谷成熟。字形采用“禾”为偏旁,“千”是声旁,生动地演绎出了“天时—地利”的中式道理。换言之,“年”既是时序在农作中的

具体体现,又是生命之“时”的反映。

西方的粮食生产同样也是维持生命之重,却完全没有“中式道理”。粮食在西方的博物学中完全属于作物物种,西方的粮食主要以麦作为主,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饮食主要以面包为主食的原因。西方的麦穗,拉丁文为 *spica*, 古词为 *speca*, 源自 *spe*, 意为希望。它的核或称作麦粒,拉丁文为 *granum*, 源自 *gerendo*, 意为果实。^[10] 也就是说,西方麦作文明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劳作带来收获,收获带来希望。西方的博物学思想以纯粹的自然环境、自然因素为“事实”根据,比如种子的传播,“大自然总是采取最简单的来达到它的目的。”^[11] 无论是自然因素,比如风的作用,^[12] 水的漂流,^[13] 还是动物的携带,包括通过食用排泄的迁移的传播方式等,^[14] 无不表明生物物种,特别是动物和植物的“自然属性”成就了物种的传播与延续。人只是简单地根据自然的相关属性而顺应之。

我国的农业博物学却并不完全如此。为什么“天时”如此重要?“天”不仅代表自然的“至高”,而且控制、指导着时间;时间又是生命、生计和生产的直接兑现。所以,在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里,不仅有“天命”的概念,——“天命不可违”,即自然“命数”不可违背,将“天(自然)”上升到世间万物掌控者的高度。又由于“天时”是农业的时序指南,所有的农作都是根据一年四季的“农时”进行生产活动。即使我国的南北差异较大,有北方麦作、南方稻作之区分,却无例外地遵守农时的自然规则。“农时”不可误,更不可错。如果违背时序,错过农时,必将遭受损失,亦将受“辱”,错失者也必将受到惩罚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之:“辱,耻辱也,从寸在辰下。失农时,于封疆上戮之也。”辱从辰,辰为农时,误失农耕季节。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“辱”与农事有关,“辱”的本义后来被“耨”字所替。^[15]

农耕文明以农作物为重者,“禾”最具代表性。汉字中多现其迹。“禾族”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表述理念: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中

的“利”与“和”皆从“禾”。第一个统一了“中国”的封建帝制名曰“秦”,——即由“秦国”统一六国之沿袭;“秦”亦从“禾”。至于“年”“种”“税”“私”“秩”“科”“秀”等皆为“禾族”,可知其作为农耕文明之关系的密切和重要。《说文解字》言:“禾,嘉谷也,二月始生,八月而孰,得时之中,故谓之禾。”^[16] 言“禾”为嘉谷,来自《生民》:“天降嘉谷”。古代农书皆袭此义,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续之。^[17] 而“嘉禾”典出《书·微子之命》:“唐叔得禾,异亩同颖,献诸天子。王命唐叔,归周公于东,作《归禾》。”^[18] 由此可知,“嘉禾”既泛指予民以生计的农事,也指生长茁壮的稻谷。在古代,“农正”历来为古代社稷第一政务为农的表述。而“嘉禾”也隐喻王者德绩,并将天下太平衍义为“嘉禾”。

“和”从禾。《中庸》云:“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”“和”故被示为最高的德行。^[19] “和”作为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最高哲学理念,是古人心目中自然界和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状态,正是脱胎于传统的农作文明的原型。“和”之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言,首先是表达“天时—地利—人和”的协作关系。其次是农业丰收即有“富裕”,“富”从“田”,“裕”从“谷”,进而“幸福”,“福”亦从“田”,全部尽在田中嘉禾。^[20] 许多人常常从哲学的高度讲述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道理,却经常忽略了“三才”关系直接来自于农业,来自于物候,来自于“生态—生计—生产”关系。换言之,中国传统哲学原理之大者皆潜藏在博物学中,而中式博物学之要旨却真切地表现在“禾—和”之中。它是务实的,经验的,却也无妨超验。

概而言之,我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圭臬就是“天地人”一体而追求“中和”。表面上已超出我们所认知的博物学范畴,笔者却认为,这恰恰是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中式博物学原理。在人类学和博物学的视野里,“自然—人文”是一对基本的分类概念,前者以“客观”为基础,后者以“主观”为视域;哪怕实验室里的“科学事实”也是“人为”的结果。笔者相信,融“天地人”为一体

的中式博物学思想可以为今天的生态危机提供“切身疗法”。

四、博物中的食物链

我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吃饭,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,哪样不是生物多样性食物链的展示、品尝和体验?人每天都享用各种生物(动物、植物等)所提供的食物,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正是“生物多样性”。换言之,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因“它”存在才有“我”存在的世界,从最简单的食物链的角度看,我的“活”是建立在它们“牺牲”的基础上,而“我”却丢失了感恩的心态。更有甚者,成为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凶手。

美国学者罗宾斯在《食物革命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:

今天,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,人类跟其他所有生物一样靠这个星球生存。如果污染了空气和水,那就在威胁我们自身的生存,假如我们毁灭雨林并耗尽自然资源,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并以更快的速度释放其他温室气体,使地球根本没有时间加以“处理”,那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。^[21]

可怕的是,人类的欲望、饕餮的胃口、失范的伦理正在进行着“拿热带雨林交换芝士汉堡”的行径。一位博物学家曾在亚马逊热带雨林方圆3英里的范围内找到700个蝴蝶种类,而整个欧洲仅有321个已知的蝴蝶品种。^[22]生物学家的数据告诉我们:如果按照“正常的”生物灭绝水平,每年大约有10~25个物种消亡;然而,实际情况是,每年有数千个物种灭绝,也许有上万个。^[23]生物链被破坏,生物种群在加速灭亡,人类的生活、生命和生存也逻辑性地出现了危机。

中国传统的博物精神首先体现在农业生产和食物提供的“多样性”,不少值得表彰。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被称为“社稷”。我们可以把“社稷”的复杂关系简化为: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是祭土(社),最紧要的事务是粮食(稷)。土地的神圣,粮食的“第一政务”决定了人们的生计

方式。加之与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认知相协,中国将粮食通称为“五谷”——成为“五方”(中国——“一点四方”,通称“五方”)的一种表述。换言之,农耕传统文明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植入了土地与粮食之中。这种“神圣—世俗”价值通融,不独为“天地人”共同体的基本认知价值,也将食物问题上升到国家政务的层面,即“农本”。

在这种博物价值的主导下,作为与“自然”相契合的食物链也得到了相应的保证和保障。综观世间所有生物,特别是动物,寻找和获取食物是其第一需求。人作为生物“类”(人类 man-kind)之一种亦无例外。换言之,人与自然关系中最神圣,又最为世俗的事务正是食物。在中式农耕文明的背景下,农产品给人们提供主食来源。依据博物原理,对于食物而言,由于农业生产是根据时令进行生产活动,什么时令生长什么食物,人也就根据这一原则进食。正如孔子曰:“不时不食”(《论语·乡党第十》),说的就是遵循自然之道,所食之物要应时令、守季节,什么时候(季节)吃什么东西。古人表述为“应节律而食”,指的是不吃不是时令的东西,讲究的是食物要符合时令节气规律(自然规律)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的食物链除了满足果腹的基本需求外,还有养身和治病的功能。中医药中的绝大多数的“药方”是根据身体的病症,以“食疗”的方式进行治疗。有意思的是,这些“食药”也依照社会的等级秩序伦理与身体疾病轻重缓急之“方”相对应。比如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名例分类就配合由“天地人和”所延伸出的伦理秩序所制定的原则:

上等药一百二十种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,无毒,多服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,不老延年者,以上经为本。

中等药一百二十种为臣,主养性以应人,无毒有毒,斟酌其宜。欲遏病、补羸者,以中经为本。

下等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,主治病以应地,多毒,不可久服。欲除寒热邪气,攻积

破聚,治愈病患者,以下经为本。

上称三品药共三百六十五种,取法三百六十五度,一度应一日,以成一岁。其数翻倍,成七百三十种。^[24]

传统中医药将天地人置于一个完整的机体,“岁月日”的运行周期融入其中,“服养”生命,将“宇宙—生命—食物—医药—等级—秩序”化为一体,这种“博物体制”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。

概而言之,博物学虽然是研究各种生物物种之间关系的学科,但其基本原则是“五生”——生态、生命、生计、生产、生业的整体性照应。而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种群,“食物—生存”关系都是第一位的,而且是永恒的。连带性地,食物链与生态、生物多样性也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关联体。当代的生态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是食物链被破坏。因此,恢复和保持“原生态食物链”也就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五、结 语

作为大自然的生命体,生物的诞生、演化所遵循的首要原则是“顺应自然”。因为生物(包括人类)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。只是,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,“人工”成为代表“文明”的标志,是其他生物种类无法比拟的“杰作”。人类的“伟大”也正来自于此。但是,遵循自然规律是人类必须实践的价值,这是“铁律”。于是,“自然—人工”成了一对既协作又矛盾的概念。人类有今天的发展,生态有今天的危机,很大程度上也由此演绎。事实上,今天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的破坏,很大程度正是因为人类的“人工性”强势所导致。于是,解决好这一组关系,化解这一对矛盾也就成了决定性因素。以笔者之浅见,在二者的关系中,“人工”是配合性的,即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的“人为”,这是前提,违背自然规则的“人为”与“人工”,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。中国传统博物学思想所表现出的基本价值、理念、实践与经验,——无论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宇

宙观,“禾—和”的和谐关系,还是“不时不食”的进食主张,皆堪为世界典范。然而,我们现行的价值观、生命原则似乎与之渐行渐远,需要反思,需要警示。如果我们缺乏博物学知识,那么,化解生态危机,保护生物多样性只能是空话。

注释:

[1]《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》,《人民日报》2020年10月1日。

[2]参见彭兆荣:《博物体:一种中国特色的生态概念与模式》,《福建艺术》2010年第2期。

[3]参见彭兆荣:《天造地设:乡土景观村落模型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20年。

[4]参见彭兆荣:《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视野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21年。

[5]参见郑重:《中国古文明探源》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16年,第260—261页。

[6]《礼记》,张树国点注,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9年,第101页。

[7][15][19][日]白川静:《常用字解》,苏冰译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0年,第62、234、460页。

[8]参见刘晓峰:《二十四点节气的形成过程》,《文化遗产》2017年第2期。

[9]李根蟠:《中国古代农业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年,第161页。

[10]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:《瓦尔登湖》,孙致礼译,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9年,第120页。

[11][12][13][14]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著,[美]布莱德利·迪恩编:《种子的信仰》,陈义仁译,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9年,第6、35、113、10页。

[16][汉]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44页。

[17][北朝]贾思勰:《齐民要术译注》,缪启愉、缪桂龙译注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71页。

[18]“归禾”,赠送嘉禾。归,通“饋”,象征天下和同的嘉禾,为周公之德所致。王命赠于周公又命作《归禾》篇,已亡——笔者。

[20]参见彭兆荣:《脱贫攻坚:中国的致富之路与造福之理》,《学术界》2020年第9期。

[21][22][23][美]约翰·罗宾斯:《食物革命》,李尼译,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1年,第224—225、245、258页。

[24][明]李时珍著,紫图编绘:《本草纲目》,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45页。

[责任编辑:刘姝媛]